

論廣州與海上 絲綢之路



廣州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中心
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
廣州古都學會

上海與廣州 絲綢之路論

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
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
广州古都学会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(粤)新登记 11 号

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/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,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, 广州古都学会 编——广州: 中山大学出版社, 1993-08

ISBN 7-306-00760-2/K·101

I 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

Ⅱ ①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②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③广州古都学会

Ⅲ ①贸易 ②历史 ③海上丝绸之路

封面题词: 欧 初

责任编辑: 蔡浩然 钟星之 林康裕

责任校对: 钟永源 王国颖

责任技编: 姚明基

封面设计: 方楚娟

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)

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

广州市万象有限公司电脑排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 印张 18万字

印数: 1-2000册

定价: 6.80元

目 录

一、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兴起与发展

广州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兴起与发展	邓端本 (3)
广州成为海上“丝绸之路”起点的地理 经济条件.....	黄启臣 (30)
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“丝绸之路”航线	王长庆 (37)
义净对勃兴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卓越贡 献.....	钟永宁 (54)
光塔——广州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丰碑	杨 棠 (60)

二、海上“丝绸之路”与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

广州在海上“丝绸之路”中的地位和作用	袁钟仁 (67)
广州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——丝绸、 陶瓷和茶叶.....	陈坚红 (94)
清朝“一口通商”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与 海上交通	何礼荣 (112)

广州怀远驿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	丘 华 (119)
广州十三行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	史 彦 (121)
广州是海上“丝绸之路”东西方文化	
交流的门户	邓端木 (124)
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经广州海上“丝绸之路”	
对西欧国家的传播和影响	黄启臣 (145)
广州建筑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	邓其生 (159)
海上“丝绸之路”对教门习俗的形成和	
影响	杨 棠 (170)

三、海上“丝绸之路”有关的人物、文物、 遗址与名胜古迹

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有关的人物	夏 丰 (179)
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有关的文物	钟 声 (186)
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有关的遗址和名胜	
古迹	日 生 (200)

四、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精神在当代的弘扬与发展

海上“丝绸之路”——当代国际性考察	
研究的大热门	何礼荣 林康裕 (221)
黄埔南岗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	
.....	李 中 区盘根 (232)

五、海上“丝绸之路”大事记

海上“丝绸之路”大事记	邓端木 (239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编后语	(247)
-----------	-------

一、海上“丝绸之路” 的兴起与发展

广州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兴起与发展

邓端本

丝绸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，我国的丝绸生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。由于丝绸的外传，形成了举世瞩目的“丝绸之路”。

“丝绸之路”又分为陆上“丝绸之路”和海上“丝绸之路”。陆上“丝绸之路”是指经过我国陇西高原、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，进而抵达中亚、南亚、西亚和欧洲等地的交通线，它的起点是长安。海上“丝绸之路”主要是指通过南海、马六甲海峡，进而抵达印度洋、波斯湾、红海等地的海路，它最早的起点是广州。

一、航海先驱者与广州的兴起

广州作为一个集市，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。根据地方志的记载，早在周夷王八年（公元前 886 年），广州这个地方便有“楚庭”之建。当然，“楚庭”的建设是否事实，目前仍有争议，但根据考古发掘，西周时期，这里成为了一个聚落和市集，则是可以肯定的。

广州又称羊城，这是根据五仙骑羊含穗降于楚庭的神话而来的。传说在周夷王时代（也有说在周显王时代），曾有五个仙人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，骑着不同毛色的羊，降落于楚庭，口诵祝词曰：“愿此阡阡，永无饥荒。”言讫，化作五彩祥云，腾空而去。现在广州坡山的五仙现，仍然供奉着五仙

人。神话虽然不同于真实，但这个美丽的传说，也可以作为岭南开发史的参考。即居住在这一带的土著居民，最低限度在周夷王时期便学会了农耕，认识到农业的重要，故以美好的传说来赞美五谷，犹如仙人之降福于大地也。

古代的岭南地区，是百越族人民聚居的地区，由于地处南疆，所以又叫南越，居民叫越人。公元前 214 年，秦始皇统一南越后，郡尉任嚣在广州建番禺城（广州古称番禺），又称任嚣城，是广州有历史可据的最早城建。秦平南越后，建立郡县制，把岭南地区划分为南海、桂林、象郡三郡，广州是当时的南海郡治。

古代的越人，是我国的航海先驱者。史载“越人善舟”，习于航海。他们很早便在东南沿海和太平洋群岛之间开展航海活动，有段石磙，是百越新石器文化的特型器物。这些有段石磙除了在台湾、菲律宾等地发现外，在太平洋的玻里尼西亚群岛和苏拉威西以及北婆罗洲一带，均有发现，证明越人曾经通过航海到过这里。1976 年，在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中，曾挖掘出一面铜鼓，鼓身绘有双身船纹图形，形式与现在太平洋上诸群岛民族（如汤加、萨摩亚等）使用的双身独木舟极为相似。再参考这些岛屿流传的神话，以及有段石磙的发现，说明百越文化很早便向海外传播。众所周知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，从来就是双向的，既然越人能航海至太平洋群岛等地，也当会有东南亚国家的人民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。

成书早于《史记》约 30 年的《淮南子》，在《人间训》篇说：秦始皇进军南越，有仰慕南越犀角、象牙、翡翠、珠玑的成分在内。当然，秦始皇统一岭南，绝不会仅仅是为了这些珍宝，还会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目的，但从这则记载中，我

们可以知道，早在秦始皇统一南越之前，广州已因集散犀角、象牙、翡翠、珠玕等物而扬名于世了。所以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提到汉初全国 19 个城市时，便把番禺列为一大都会，是珠玕、犀角、玳瑁、果、布汇萃之地。

据研究，这些产物在我国海南岛和合浦地区也有生产。但海南岛当时人烟稀少，生产方式落后，其产品不足以形成番禺作为全国主要市场的条件。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也说，除了海南岛以外，中国要取得以上这些珍品，还有其他的途径。其所指便是从国外进口。现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《吕思勉读书札记》一书中也说：“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言番禺为珠玕、犀角、玳瑁、果、布之凑，此语非指汉时，可见陆梁之地未开，蛮夷贾船已有至交，广者矣。”所谓“陆梁之地”，即古代对岭南地方的一种称呼也。

关于“果布”，最近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又有新的解释，认为“果布”并非水果和葛布，而是“果布婆律”的音译，是马来语对龙脑香的称谓，表明那时的东南亚已有香料输入广州。事实上近年来在广州汉墓出土的文物中，有众多薰炉出土。薰炉是用来燃薰香料的，说明当时香料已在广州社会生活中出现。香料主要产地在东南亚，故“果布”即“果布婆律”的解释，亦不是毫无根据的。事实上，香料也是最早从南方输入，然后才进一步普及到全国各地的。

在汉墓出土文物中，有迭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蓝色玻璃碗等。关于这蓝色玻璃碗，有不少人认为是从西方进口的。因汉代我国玻璃工艺仍以琢玉法制作为主，制作的東西多是璧瑗、印章和其他饰物。而广州汉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，却不是用琢玉方法制成，而是用热处理的方法制造的，从形制上和技法上看，也不象是中国传统的玻璃器皿。关于玻璃从国

外的输入，我国从西汉时期便已经开始。西汉桓宽的《盐论》便有说：“璧玉、珊瑚、琉璃咸为国之宝，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洩也。”

在汉墓出土文物中，还有一种托灯的陶塑俑和侍俑，这种俑深目高鼻，两颧高，宽鼻厚唇。考古工作者认为他们就是杨孚《异物志》中所记的“瓮人”。杨孚，东汉时人，曾在汉章帝时期（76年至88年）任议郎之职，汉和帝时（89年至105年）著《异物志》。该书内容广泛，记述当时的广州有一种“瓮人”，这种人面体漆黑，多为大户人家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奴仆。很明显，他们就是后来被称为“昆仑奴”的黑奴。他们有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来的，也有可能是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的。总之，他们是从外国进口的。这种“瓮人”既为杨孚记入书中，说明他们的人数是有相当数量的，其进口历史亦有相当的一段时期了。

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形成，促使广州附近种桑养蚕业的建立。东汉末年，广州已有桑园出现了。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卷三十七记载了这一情况，谓汉献帝建安中期（206年至216年）孙吴政权派遣步骘为交州刺史，当其抵达广州时，曾登高远望，在起伏的丘陵地带中，见桑土成行，“原薮殷阜”，物产富庶，所以步骘乃把交州的治所从广信迁至广州。可见海上“丝绸之路”促进了广州经济的发展。

可以推断：越人航海，开拓了南海道的海洋航线，引起了东南亚、南亚与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、文化交流。国与国之间经济贸易，起到互通有无的作用，满足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需要，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。上面所说秦始皇征南越，有仰慕越之犀角、象齿、珠玑、玳瑁的成分在内。而汉武帝征南越灭南越国，也有希望掌握南海门户——广州的成分在内。

从汉武帝征南越后加强与南海各国的交往、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情况来看，海上“丝绸之路”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。而广州港也就在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形成和发展中兴起。

二、早期的海上“丝绸之路”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首记南海道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航线。据该书称：在汉武帝时期，由宫廷派出一批译使，与招募到的商人、水手一起，从徐闻（今广东徐闻县）、合浦（今广西合浦）、日南（今越南顺化）三个地方出航，途经都元国、邑卢没国、谶离国，再从谶离国步行十余日，到夫甘都卢国，自夫甘都卢国乘船至黄支国，然后南下已程不国，返航途中经皮宗，最后在象林县边境的地方登陆。译使携带出去的是黄金和丝织物，换回来的是明珠与璧琉璃及奇石等异物。诚然，书中所列的地名，除出航和归航登陆的地点外，其余的地点在学术界中仍无统一的认识，考证的难度亦非常之大，但经过多年的研究，黄支国在印度半岛东海岸，即《大唐西域记》所说的建志补罗，则是意见比较一致。

据此，汉译使乘坐的船舶由徐闻、合浦、日南三个地点出航后，首先是围绕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线航行，渡暹罗湾后，进入马来半岛东部海域，航行了一段时间后，即弃舟登陆，步行通过马来半岛中部的克拉地峡，然后再在西岸的一个港口重新登舟，横越孟加拉湾以达印度半岛东南隅的黄支国。

为什么早期海上“丝绸之路”要作这样的走向？海行之余还要走一段陆路？原因是在航海和造船技术均不发达的古代，远洋船舶只能围绕海岸线作近海航行，在围绕马来半岛

海岸线航行的过程中，步行横越半岛的行程比乘船绕过马六甲海峡短，整个路程所花的时间也要减少，而且还可以避免马六甲海盗的骚扰，航行亦比较安全。据史书记载，在当时横越马来半岛的主要商路一共有四条：第一条是由克拉地峡东岸附近的巴蜀西行，陆程至雅令加，或雅令加西南的盘惠色郭，然后改由河运，顺流直下丹老；第二条路线是从东岸的万仑港乘船至山国河上游，再步行至大瓜巴河下游，然后重新坐船至大瓜巴港；第三条路线是从夜功河流域的蓬迪（在今佛统附近），经三塔径抵达西岸的毛淡棉（在今缅甸境内）；第四条路线是从六坤至董里（即投拘利）。按照《梁书·扶南国传》记载，当时的克拉地峡是属顿逊国的国土范围，顿逊是东西方交通孔道、东南亚地区国际贸易中心，来这里贸易的日有万余人，珍货宝物，无所不有。该书在分析它繁盛的原因时说：“从交州往印度的客商都要在这里登陆，因“涨海无涯岸，船舶未得迳过也。”“涨海”指现在的南海和东南亚海域，“无涯岸”辽阔之意也，就要说船舶抵达此地之后，就不再继续航行了。故此，商人多集中在这里贸易。事实上，在这一带的确发掘出中国制造的铜镜，印度笈多王朝的铜器，还有属于一世纪至二世纪的罗马式灯盏。这证明中国、罗马、印度商人，都曾集中在这一带贸易，而顿逊也就充当中转口岸，成为早期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一条主要航路。

但是，当时的马六甲航道亦已开辟，如汉之译使从斯里兰卡归航时，有不少人便认为他们走的是马六甲航道。书中所记归航时经过的皮宗，便是马来半岛西南沿海的香蕉岛。

公元2世纪至3世纪初，在今柬埔寨兴起了一个扶南王国，大力发展航海，并吞了邻近的十余个国家，疆土拓展至五六千里。吴时曾遣中郎康泰、宣化从拳朱应出使该国（时

间大约是 222 年至 280 年)。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很发达，顿逊是它的属国。此外，在离该国首都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阿克厄呵（OCEO）的国际贸易港（在今越南迪石北部），这个海港有运河与湄公河相通，并且在公元一二世纪间已非常繁荣。考古学家曾在这个古港的遗址中，发掘出罗马念珠数千枚，镶有罗马王像的金薄片徽章二枚，中国制品铜镜一枚，波斯制品玻璃质园片一枚等等。

在这期间，中国与爪哇已正式有航路往来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传》载东汉顺帝永建六年（131 年），叶调国王便曾遣使贡献。据法国汉学家费瑯的考证，叶调国就是今天的爪哇岛。叶调使臣入朝中国之航路，当是循邦加海峡，沿苏门答腊、马来半岛和印度支那海岸，而达交州、广州的（参见费瑯《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》）。费瑯并提出，这条航道也是马来群岛人之远祖曾经走过的古航道。可见这条航道亦是早期中国丝绸往外传播的一条通道。

在这期间，中国丝绸也辗转通过印度、波斯等国。传播到欧洲的罗马帝国，中国当时称它为大秦。大秦从陆路和海路输入中国丝绸。陆路通过安息（即波斯），海路则通过印度。印度和罗马都有船航行于埃及的迈奥霍穆至马拉巴海岸之间，特别是奥古斯多至尼禄帝这一段时期，达到了高峰。当时的丝绸运抵罗马后，价等黄金。据罗马学者白里内（23—79 年）的估算，每年流入印度、中国及阿拉伯半岛的金钱，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（罗马货币名称）。由于丝绸贸易的利润极高，所以波斯商人总是想尽千方百计，利用其地理上的优势而企图垄断。大秦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又要打破这种垄断的局势，于是爆发了 162 年的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。战争结果，罗马占领了波斯湾头，取得了通中国的出海口。为此，出现

了东汉桓帝延熹九年（166年）大秦王安敦（即罗马帝国麻赫斯泰雷斯安拖尼诺斯皇帝）派遣使节从日南徼外来献的情况。当时的罗马使者是由波斯湾出航的，经过印度河口，沿印度海岸越过伊洛瓦底江口，围绕马来半岛航行，经过占婆（今越南南方）海域到达日南登岸。史书记载他所贡献的礼品没有什么奇珍异宝，因此怀疑他是一般的商人，不过是借贡使之名来中国行商罢了。然而，罗马欲直接与中国贸易，这却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三国孙权黄武五年（226年），大秦商人秦论经商来到交趾，受到孙权的接见；281年（西晋太康二年）大秦国遣使贡献，航海至广州北上济阳，朝见晋武帝，带来的珍宝中有火浣布一种，点火不燃，可能是现在的石棉布，晋殷巨还专为此布写了一首《奇布赋》。在这期间，罗马皇帝喀鲁斯还征波斯（时间为282年至283年），陷克泰锡封城，用武力维护了波斯湾头的交通。于是大秦商人活跃于海上“丝绸之路”。《南史》卷八谓“其国人行贾，往往至扶南、日南、交趾。”当然，也有至广州的。

综上所述，早期通过南海道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通商贸易已非常频繁。其主要航线共有四条：第一条是广州至越南、柬埔寨航线；第二条是广州至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或苏门答腊航线；第三条是广州至印度、斯里兰卡航线；第四条是广州至波斯湾转罗马帝国航线。活跃在这几条航线的有中国人、柬埔寨人、印度尼西亚人、印度人、波斯人和罗马人等。其交换的主要商品，除丝绸外，还有黄金、珍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翡翠、玳瑁、香料、玻璃、铜器等等。

三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“丝绸之路”

自三国经两晋至南北朝，360 余年间，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南北分裂状态。由于岭南地区距离中原较远，战火很少波及到这里，因此局势也相对地比较稳定。

三国期间，广州属孙吴的势力范围。吴国很重视东南沿海的开发，除了在黄龙二年（230 年）派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带领军士万人航海至台湾外，又于赤乌五年（242 年）令将军聂友、校尉陆凯领兵三万人，航海至海南岛，从而进一步巩固对广州的统治。由于东吴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，因而引起广州外贸商务的繁荣，从东南亚各地运来的贵重商品，多从广州、交州进口。广州还是一个海军基地，驻有强大的海军，并长期把交州的州治设在广州。

东吴对广州的经营，为广州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西晋初年，罗马帝国使节往洛阳朝贡之所以乘船取道广州，就因为广州当时已经是海外贸易的中心了。《晋书·义阳成王望传》记有禁止官吏至交、广两地经商的史料，说明广州外贸在这时期有较大的发展，所以朝廷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。到了东晋之后，更有“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，便得三千万（钱）”的说法，并有广州“贪泉”的掌故在流传。说的是广州石门的北面，有一眼泉水，饮过此泉水的人，都会产生一股贪婪的欲望。东晋隆安中期（399 年），朝廷派吴隐之为龙骧将军、广州刺史，他特地到石门饮了一勺贪泉的水，并成诗一首曰：“古人云此求，一歃怀千金。试使夷齐饮，终当不易心。”

“夷齐”是指商朝的遗臣伯夷、叔齐。他们于商土之后，

耻食周粟，活活饿死在山谷里，以表示其宁死不屈的气节。吴隐之借用这个典故，亦表示他崇仰伯夷、叔齐的坚贞，绝不同流合污。贪泉的掌故当然是人们对广州贪官污吏辛辣的讽刺，但此事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广州外贸的繁荣，即由于外贸的发展，所以官吏才能藉此而大饱宦囊，以权谋私。像吴隐之这样的清官，是极为少数的。后人为了纪念他，把他的诗和“贪泉”两字，刻在一块石碑上，此碑现在仍存于广州博物馆。

按照法显《佛国记》的记载，东晋时从印度或斯里兰卡经耶婆提（爪哇）至广州的航线；已有定期航班往来。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（399年）自长安出发往印度取经，由陆路抵达该国。在遍游北天竺、中天竺和东天竺之后，于409年在印度的耽摩立底乘船到达师子国（今斯里兰卡），然后再于义熙六年或七年（410年或411年）乘船取道耶婆提归国，原计划是从广州登陆，后遇大风吹至牢山湾上岸。法显归程说明，当有众多的印度船舶或东南亚国家的船舶航行这一条航线。

据考证，法显的航程是穿越巽他海峡而来的。这一条航线也是在1100年之后，欧洲人东来的航线。毫无疑义，这是一条深海航线。当时的船舶敢于开辟深海航线，证明造船技术已有极大的提高，船舶的御风能力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，航海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。

进入南北朝以后，广州的海外贸易又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。《宋书·蛮夷传》用“舟舶继路，商使交属”来形容这一时期的繁荣盛况。前来贸易的国家有罗马、印度、斯里兰卡、占婆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等国。《南齐书》说：“四方珍怪，莫此为先。藏出隐海，瑰宝溢目。广州成了东方国际贸易的中心。那四面八方的稀世珍宝，都先到这里集中，